

# 科学与人文何以互为需要

■郭英剑

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为主导、人文边缘化的时代。

科学技术的含义可谓众所周知。但对于“人文”，说起来就要复杂一些。“人文”在英文中主要有两个词来表示，第一是 humanities。一般来说，humanities 指的是通过分析、批评和观察等方法研究人的境况的学科，主要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美术、音乐、戏剧等。第二个词是 liberal arts。但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译作“文理”，比如在指称美国的一些四年制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s 时，就翻译作“文理学院”。当然，若是从 liberal arts colleges 的核心课程以及培养目标来看的话，翻译作“人文学院”也说得过去，只不过似乎不如“文理学院”更能够让人对学校的性质一目了然。

在全球化的今天，针对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人们不断在质疑的问题是，学人文有什么用。特别在以人文科学见长的文理学院之中，这样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这里人们更多质疑的是文理学院中的第一类，即有关人文类的知识。由此我们看到，在科学技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人文学科不但被边缘化，而且还被置于科学技术的对立面。因此，人文学科的位置在哪里，与全球主导性的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这些似乎都成了一个难题。

2011年10月底，美国波士顿学院的人文研究院（这并非是该校的文理学院，而只是研究人文学科的机构）召开了一次题为“在文理大学中，科学何以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研讨会。

波士顿学院是一所文理学院。召开的这次高峰论坛，主题是探讨在文理学院的语境下，基础的理论科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实际上更多地探讨了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正如该校人文研究院院长克莱恩（Mary Crane）所说，“我们希望寻找找到从科学的角度去探讨重要问题的演讲者，他们同时也应该谈论人文学科（humanities）、社会科学以及科学的重要性。而这些演讲嘉宾的观点，对于我们当今认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无裨益。”

在此次研讨会上，共有四位专家应邀担任演讲嘉宾。第一位是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作为《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她提出了“人类纪”（anthropocene）的观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人类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地质学时代，我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不仅要通过科学知识，还与各种人文学科有关。第二位学者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品克（Steven Pinker）。他主要讨论了自己的新著《暴力行为下降的历史及其缘由》。

接下来，弗吉尼亚大学的传媒研究与法律教授威德亚纳森（Siva Vaidyanathan）针对“科学何以重要”的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当今社会之中，占据前沿地位的工程师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知识的鸿沟，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着力在全社会强调批评性思维，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地在于学科划分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知识之间架起桥梁。身为传媒研究与法律专家的威德亚纳森说，科学家需要借助我们的帮助，才能够创建一个更富文化、更为关键的城邦。科学的文化不是追求科学的回归，而是要让人们能够看透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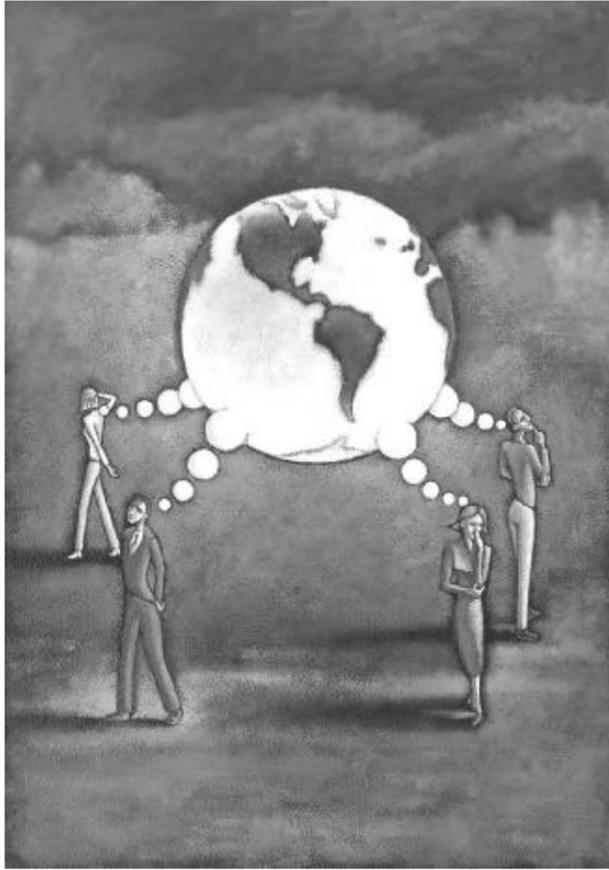
第四位演讲者，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格林（Brian Greene）结合自身的经历，在演讲中呼吁提升人们的批评性思维能力，才能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他说：“科学就是一个巨大的想象力的运动场所，同时也是以集体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的伟大范式。”在谈到“科学何以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格林强调指出，公众如果对于像理论物理这些研究领域的进展有所了解的话——尽管相当困难，就可以使人们更多地从跨学科的角度去看问题。

此次会议之后，克莱恩教授与奇利斯（Thomas Chiles）两人在《高等教育纪事》上刊登了题为《为什么人文需要科学，反之亦然》的文章，对此次研讨会作了总的评述。

文章认为，在21世纪，人文教育无疑需要重新审视其概念与范畴。当许多人说人文学科应当居于中心地位的时候，其他人在质疑：事实还是如此吗？当科学占据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人文教育又会怎么样？文章指出，在波士顿学院的研讨会上，人们的很多观点是毋庸置疑的。比如：科学知识至关重要，不然人们无法理解地球变暖、物种灭绝、社会进化、技术与数字媒体与人类捕捉信息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技术变化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公共政策等等。

然而，该文认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最重要的一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在一所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中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由科学家单独加以解决的”。在此次研讨会上，贯穿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对

在一所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中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由科学家单独加以解决的。



图片来源: www.quanjing.com

于科学家来说，有必要对其“大科学”（big science）的重要性及其科学发现的含义与大众做好沟通工作。比如，对于像地球气候变化这类复杂的问题，需要科学家去挖掘并阐述其根本原因。但与此同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同样需要去评估气候变化之于人口与社会的影响，而新闻工作者则需要把这类信息完整地传递给社会大众。

文章提出，在一个环境和经济都面临挑战的高度技术化的时代，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和辨析科学证据与科学观点的能力至关重要。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出路之一就是需要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比如新闻、经济、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的鼎力合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把科学的新发现及其与社会相关的联系向社会大众解释得更好更清楚。

## 他山之石

栏目主持: 年智英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首创的“教育领导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培养创新型的教育领导者。“教育领导博士”学位在培养目标、过程设计、课程组合和评价考核等方面都有创新之举，这对我国如何实施教育博士培养有所启示。

# “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启示



■李云鹏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但无一例外都面临诸多棘手的问题。在美国，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批判之声从未停止过。普遍而严厉的批评引发人们对教育改革不断的反思。结果发现：教育改革的领导者普遍缺乏高层次专业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行为方式都存在必须提高和改进的必要。而传统的针对教育领导者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领导人墨守成规者居多，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学校变革的需要。因此，向来以培养教育领导者为己任的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率先设置了“教育领导博士”学位，以适应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对开拓性领导者的迫切需要。

### 推动变革的催化剂

“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使命是为学校系统、教育行政机构、国家政策组织、基金会、非营利性组织和私营部门培养高级领导者。对于这一新学位的定位，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凯瑟琳·麦卡特尼强调，这是一个“推动变革的催化剂”，其目标不是培养私营现存体制的领导者，而是培养能够实现教育体制成功变革的新一代新型领导者，希望他们改变教育改革被动低效的局面，培育公立与私立机构之间强大的伙伴关系，最终恢复人们对美国学校系统的信任。

“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学制为3年。第一学年的4门核心课程由高度集成的三大领域构成课程模块。核心课程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和学习

方式，如案例讨论、情境模拟、实地工作、在线学习等，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发展和实践作为领导力所需的开拓性思维方式和多视角分析问题的习惯。第二学年是讨论课和选修课。研讨课的目的是深化对前一年课程的理解。学生还将与导师密切合作，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学习方案。选修课是从教育研究生院、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各推荐3门课程，学生从中至少选修6门。在第三学年，学生将进入尖端体验阶段，学生在合作伙伴组织中实地领导一个改革项目。尖端体验要求学生全面系统地投入到组织领导工作中去，尤其是在实习组织中处理亟待解决的问题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和成效。

通过1年真正意义上的挂职实习，学生将充分利用他们获得的知识，测试他们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当然，实习期间导师和研究生院将随时给学生提供专业指导所需要的关系网络服务。学生也将与哈佛大学保持联系，并定期返回哈佛大学参加强化工作室。

■胡乐乐

据媒体报道，著名海派清口笑星周立波捐款60万元在复旦大学设立“海派清口精英奖”并于日前颁奖。这个奖项从设立初到颁奖后，一直引发复旦校内外的持续热议，大家激烈争论接受周立波捐款，设立该奖学金的合理性。

支持者认为，只要奖学金的捐款来源是合法的，能促进学校和学生的成长就好，而不能因为捐款方是来自娱乐界的，就遮遮掩掩或搞区别对待。然而，反对者则坚称，公立大学是社会的特殊部门，在大学设立冠名奖学金，关于大学的公共形象和社会影响，特别是像复旦大学这样的“985工程”国家重点大学，不能给钱就收，更不能轻易就以捐款方的名义设奖，以免误导学生，带来不良影响。

### 多方启示国内教育

“教育领导博士”学位是一个全新的博士学位，它与教育博士学位有很多相同点，性质上都属于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专业实践能力。二者都强调尊重和发挥博士研究生的主体性，学生有很大的自由来设计符合个人兴趣的高度个性化的课程体系。而在我国，博士研究生的主体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博士研究生在选课与选导师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自主权，研讨课的数量和比重都很小，这既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是教育观念的问题。

在教育理念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常被视为社会发展与知识经济创新体系的发动机。对此，哈佛大学一直重视与社会的联系，针对市场需要适时设置一些新的学位和专业。“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一定程度上就是哈佛大学主动满足社会需求的表现。我国大学的

社会敏感性比较差，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相关，大学的自主性还缺乏制度的保障和内在的动力。

另外，开放办学、合作办学的理念在这一学位项目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其一，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与该校的商学院、肯尼迪学院合作，充分利用和整合三大学院的优势师资，给学生提供接触到三院乃至整个哈佛大学丰富的专业资源的机会，培养学生多学科的理论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其二，除了取得哈佛大学校方的支持外，该项目还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实施的第一年，“教育领导博士”学位项目就与38个全国性的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组织为课程学习提供了大量现实案例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为学生将来的挂职实习提供了保障。其三，“教育领导博士”学位获得了华莱士基金会提供的1000万美元的资助。因此，所有学生除获得全额学费资助外，还能在学习的前两年享受到生活津贴，并在第三年实现带薪实习，这对教育质量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 大学接受捐赠须严防“被广告”

虽然复旦大学相关负责人对此回应说，学校向来慎重并认真对待每一笔社会捐赠，并强调“捐助助学是高尚的事，捐赠方不能有附加条件和不利于学生培养的条款，反对商业和炒作行为”，但不幸的是，在“海派清口”基金的网站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获奖义务：一旦成为获奖者，也意味着成为了海派清口公益基金的光荣义工。”很显然，每位学生在获得2万元巨额奖学金的同时，即在道德上或多或少都得有义务肩负起在海外宣传海派清口的重任。

仔细想来，复旦大学“海派清口精英奖”、清华大学“真维斯楼”、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校董雕像”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大学不能接受大家所认为的不适合与大学“恋爱”的组织、机构和个人的捐款，二是大学接受的捐款不该附带要宣传捐款组织、机构和个人的条件。至少像复旦和清华

这样的公立的国家重点大学，理应注意“被广告”的消极后果，防止接受功利性的捐助助学，避免成为捐款方的广告牌。即便是在娱乐无处不在的今天，我认为国家重点大学也无论如何都应该力争保持其应有的严肃性，而不能随便设立和命名在名义上一看就不严肃的奖学金与建筑物，防止大学精神的堕落。

我们须知，大学不可随意被粘贴广告，即便接受慈善性的捐助助学，也应该严防“被广告”。这方面，大学应该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对“高校捐赠冠名”问题的指导意见。2011年5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清华大学“真维斯楼”一事回应时，就建议高校充分利用民主渠道，广泛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并与捐赠方商量，尽最大可能，找到一种既能表达对捐赠方的感谢或进行纪念，同时又能体现学校的特点和办学定位的好办法。

■王长乐

现代大学并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性质概念，需要有特定的内涵。与古代或古典大学相比，现代大学的特点是有系统的教育和教学制度、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和设施、有稳定的教师和管理队伍，以及有现代性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特别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教育观念和制度。

审视历史，可知我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为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公学”（现在的天津大学），其创办人为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尔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等现代大学相继创立。中国早期公立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中体西用”，办学路径是“旁采泰西、近学日本”，办学性质是“官办官管”。与其时创立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一起，形成了中国早期大学的多样化形态。

最早对中国现代大学办学模式进行规范的国家级文件，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主持制定的《大学令》（1912）。其确定了大学办学宗旨为培养各方面社会精英的“硕博鸿儒”，基本制度为校长任命制下的“教授治校”及“大学自治”制度。由于这种制度是吸收世界大学制度的结果，因而基本上体现了大学活动的规律，使中国早期大学有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并营造了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早期现代大学对国家、社会、文化、思想进步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不仅引领了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而且也孕育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思想的飞跃性发展。当然，在引领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前进方面，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功不可没。

对早期现在大学形态进行破坏的活动，是国民党在基本上统一中国后推行的“党化教育”（1928）。其做法为在大学中推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所谓“三民主义”，开创了政府视大学为“工具”以及政治干预大学活动的恶劣先例。这种行为打破了以往政府与大学相互制约、相互容忍的平衡态势，造成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以后的“反国民党独裁”、“学潮”变得顺理成章。

上世纪40年代末的政权交替，本可以为大学发展带来健康发展的机会。然而，当时选择的“以俄为师”路线，却使大学失去了在和平时期快速发展的良机。因为当时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并非世界范围内的先进大学体制，而是包含了浓厚实用主义意味的权宜性体制。这种体制的优点是能够促进专业人才的快速成长，但却使大学丧失自主性，变成了一种被动性的准行政组织，其教育行为也相应地变成了政治活动或生产（人才）活动。

在这种思想和制度的效应下，大学经历了连续不断的颠簸。“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武训传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反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反自由化”、“高校合并”、“大学扩招”、“政绩大跃进”等运动或活动接连不断，使大学如人一般的“心性涵养、精神陶冶、灵魂洗礼”等自我精神修炼活动，基本上没有时间和条件。大学中的活动大多还停留在“积极响应、贯彻执行”的状态，很少有大学基于自己本质和宗旨的自主活动，其精神也几乎处于飘摇之中。

回顾中国现代大学的百年历程，可见其外观形态虽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已经非常现代化，但其在内的品质却依然贫乏，大学内部的风气和品质比之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也还难以望其项背。大学在创办时期秉持的“官办官管”体制不但没有被转换，反而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使作为大学灵魂和根基的学问、知识、科学、理性的力量，因为缺乏必须的尊严和地位而没有成长和发育起来。

而由于没有彰显自己本质的灵魂和精神，因而大学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崇尚权力、俯仰权贵、沉迷政绩、醉心功利”的怪异行为，与世界大学形似而神不似。更令人叹息的是，一些对大学理应有责任的人，不仅不思如何消除大学弊端，促进大学的真正进步，反而不断制造一些基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大学理念，粉饰大学的异己现象，以至于使大学理念鱼龙混杂，与真正的大学品格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以正直和良知为大学定义，以真诚和责任为大学正名，是反思现代大学曲折历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必须进行的功课。

审视中国现代大学的百年历史，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其一，我国现代大学的移植性质，使其缺少自主成长的历史和稳定的传统，其内部也没有成长起捍卫大学本质的力量，使大学在精神上处于飘摇之中。因而，如何培育大学中的主体力量，是现代大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其二，我国早期主流大学的“官办官管”性质，以及后期的清一色公办大学性质，使其没有条件和动力促进国家层面上的《大学法》的产生，也使大学缺乏国家法律的有效保护。而在国家的层次上制定类似法律，是我国大学发展中的又一重要课题。其三，种种原因使大学失去了两次宝贵的发展机会，一是民国初期制定的《大学令》被国民党破坏，二是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党政分开”的原则，其时逢许多大学中试点的大学体制改革，但这些试点纷纷夭折。因此，接续大学制度的改革、完成大学思想和制度的革命是大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新时期大学制度改革的重要问题。